

周晓光 李琳琦

经商文化丛书

徽商与经营文化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中叶，衰落于晚清。他们在商界“称雄”三百多年，在中国商业史和商业文化史上，都写下了精彩的一页。

经营文化丛书

徽商与经营文化

周晓光 李琳琦 著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上海·西安·北京·广州

责任编辑:刘大可

封面设计:陈惠兴

经营文化丛书
徽商与经营文化

周晓光 著
李琳琦

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武定路 555 号

邮政编码 200040

上海场南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5.375 字数:135 000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 000

ISBN:7-5062-3907-8/G·27

定价:11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较全面、系统地论述了徽商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,阐述了徽商关于效益、竞争、质量、信誉、信息、人才等方面的观念,并结合丰富的历史资料,介绍了徽商的经营方式、经营中的心理活动、对经营环境的营造、商业道德、“坚韧不拔的“徽骆驼”精神,等等。全部论述均紧扣“经营文化”这一专题,从徽商所体现的种种与文化相关的内容落笔,最后还有“徽商的生活文化”、“徽商与徽州文化”两章作专门的论述。全书思路清晰,资料翔实,对徽商的研究颇为深入。本书适宜于商业史研究者、商业领导工作者阅读,对一般商业工作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徽州商帮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	1
一	徽州的自然环境	1
二	徽州的社会习俗	5
三	徽州的传统文化	7
四	徽州商帮的素质特征	9
第二章	徽商经营的价值观	13
一	效益观念	13
二	竞争观念	17
三	质量观念	20
四	信誉观念	22
五	信息观念	25
六	人才观念	28
七	途程观念	31
第三章	徽商的经营方式	35
一	资本组合形式的多样化	35
二	行商坐贾并行	41
三	商品囤积与垄断贸易	45
四	产销一体与赊购赊销	53
第四章	徽商在经营中的心理活动	57
一	自卑感与新的商业价值观的宣传	57
二	渴望尊重与夸富斗靡的行为方式	61
三	终极关怀与崇儒重仕	66

第五章	徽商对经营环境的营造	71
一	攀援权势 以为靠山	71
二	依靠宗族 作为后盾	77
三	结好文士 扩大影响	81
四	热心公益 赢得美誉	81
五	店堂文化与柜台艺术	82
六	徽商的广告促销活动	85
七	徽商的生意经	87
第六章	“徽骆驼”精神	91
一	敬业精神	91
二	拼搏精神	97
三	进取精神	100
第七章	徽商的商业道德	106
一	徽商的经营道德	107
二	徽商的社会道德	116
三	徽商的个人道德	124
第八章	徽商的生活文化	134
一	饮食与服饰文化	134
二	建筑文化	139
三	社交文化	147
第九章	徽商与徽州文化	153
一	丰富灿烂的徽州文化	153
二	徽商——酿造徽州文化的“酵母”	159

第一章 徽州商帮形成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

徽州,这个古老的地域名称,多少年来,一直名闻遐迩。就在这里曾经孕育出颇具特色的“新安文明”或者说“徽州文化”,并注入于世界文化宝库中,受到世人的瞩目。明清时期的徽州商帮,便是出身于这块山水灵秀之地,他们在商业经营中创造的商业文化,也是“徽州文化”中的重要内容,且颇具特色。

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中叶,衰落于晚清。他们在商界“称雄”三百多年,在中国商业史和商业文化史上,都写下了精彩的一页!

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,以“宗谊”和“乡谊”为纽带,以“相亲相爱”、“以众帮众”为宗旨,以会馆、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的场所。它是一种既“团结”而又松散的商人群体。徽州商帮这个群体的形成,是由于明中叶以后,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,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,商业中竞争的激烈,传统“抑商”政策的削弱,商人地位的提
高,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,商人队伍的壮大,等等因素,同时,又与徽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是紧密相关的。

一 徽州的自然环境

徽州,在三国时为新都郡,晋太康年间改为新安郡,隋开皇年间改为歙州,北宋末年方腊起义被平定后,改歙州为徽州,从此,便有徽州之名。明清两朝的徽州府,下辖歙县、休宁、黟县、祁门、婺源(今属江西)、绩溪(今属宣城)六县。我们今天研究徽州商帮或

徽州文化,其地域范围也是上述六县。由于以“新安”名郡的时间较长,人们在徽州学研究中,常常借用这个古郡名称,如“新安商人”、“新安理学”、“新安医学”等等。我们研究的对象——徽州商帮与“新安商人”名虽异而其实是相同的。

徽商的故乡徽州,是一个重峦叠嶂、烟云缭绕的山区。四周都是崇山峻岭,中间夹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平地。从比例来看,大约山地丘陵面积占80%,平地只占20%。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,这里是个闭塞之地。

不过,徽州的自然景观却非常优美独特,而且名播海外。境内的黄山,是著称于世的名山,她以云海、温泉、奇松、怪石等景观招徕了许多游人,许多骚人墨客在游览之余,留下了无数诗篇画卷和游记散文。尽管其中的清词丽句不可胜数,但也难以描述尽黄山之美,曾有“五岳归来不看山,黄山归来不看岳”之誉。在徽州境内,还有一座位于休宁县境的齐云山,以道教文化称胜江南。齐云山古称白岳,她以山奇、石怪、水秀、洞幽而闻名。山上的道观、碑刻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,构成了“天开神秀”、独具一格的画卷。

上面介绍的是徽州境内具有代表性的名山,同时,这里还有几条有名的胜水呢!

提到胜水,当首推新安江。这条江的源头南北两支分别为祁门五龙山脉和黟县五溪山。它是徽州连接浙江的重要水上通道。新安江江流清澈,像是一条绿带漫绕于群山峡谷之间,最后,注入于钱塘江。李白当年写的“清溪清我心,水色异诸水”,“人行明镜中,鸟度屏风里”的诗句,就是赞美这条山间之江的。在徽州境内,还有两个人工湖——太平湖、丰乐湖,有“皖南翡翠”、“人造锦带”之称。徽州的名山胜水,不仅是这里的天然景观,而且也是徽州人所享有的天然财富。这对明清时期徽州商帮的发迹致富和“徽州文化”的产生,都起着培育、滋润和催化的作用。

从气候条件来看,徽州属亚热带气候,雨量充沛,最适宜于植物的生长。因此,在无数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上,到处都是林木葱茏,翠绿如锦。山上的植物品种繁多,以松杉茶竹为最。如果以类分,大致有淀粉类、果品类、树脂类、纤维类、药品类等。这些特产,大多成为徽商经营的商品贩运到全国各地。在深山林木丛中,棲息着品种繁多的动物,诸如:野豕、山羊、梅花鹿、云豹、金钱豹、短尾猴、青猴、娃娃鱼、白颈长尾雉等,都弥足珍贵。整个徽州,堪称天然的植物园和动物园,或者说森林公园。

徽州的山水形胜,巧夺天工,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,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。四周群山环抱,恰似天然屏障。在古代,“道途梗阻,交通乏便”。从陆路外出,“东则有大障之固,西则有浙岭之塞,北则有黄山之隘。”山间的羊肠小道,更是崎岖曲折。从水路外出,“则东涉浙江,滩险三百六十,西通彭蠡,滩险八十有四。”^①正是由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,从乡下走出去的人很少。直至明代中叶以前,竟有“老死未入城郭者。”据方志记载,往日的徽州人,安土重迁,民风朴实。宋元时期,也很少有人经商,甚至“一闻挟薄资,游都会,相戒摇手。”^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环境影响的。

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,古代的徽州,如同一个封闭型的“王国”。不过,从御敌的角度来看,那天然的“高城深池”,倒是“固若金汤”。长时期来,这里都是人安其业,兵燹罕至,耕读相伴,不习干戈。只有元末蕞黄红巾军和地方上地主武装以及太平天国革命军和“官军”在这里发生过较为激烈的战斗,但时间也不长。正因为这里向来都是“太平世界”,所以有些村落被称为“桃花源里人家”。甚至有人认为,陶令笔下“桃花源”的原型,就在徽州呢!

说徽州是一个“封闭型”的境域,是就地理环境来看的;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往日的新安,她早就是“开放型”的地区了。

这是有史为证的。

在我国历史上,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一向是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中心,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。历史上的五大古都,有三个(长安、洛阳、开封)就在黄河流域。黄河两岸被称为中原之地,长时期来,动乱的频率最高,而每一次大的动乱,这中原之地就有大批人口南迁。他们经过江淮平原南渡长江,其中,就有一部分人流寓到古代的新安——这块静僻的山青水秀之地,于是,往日的“封闭”便被打破了。成批迁到这里来定居的大致有三次:一次是西晋末年,北方以及中原发生战乱,一些世家大族、缙绅冠带和田客纷纷避难江左。大约有十万人来到这个山区,或任官职,或入编户。第二次是唐末黄巢大起义爆发后,大河南北,烽火连天。在“天街踏尽公卿骨”的残酷斗争中,又有一批官僚士大夫、地主、百姓举家南逃,其中也有不少人流寓到这个山区定居,成为这里的“始迁祖”。第三次是北宋末年,金人南侵占领了开封,于是宋室南渡。除了宋王朝的官僚、宗室南逃到临安之外,跟随宋室南迁的一批地方官员、缙绅、地主和部分黎民也逃到江南。毫无例外,其中有一部分人便在徽州驻足。从上述三次人口的南迁情况,可以看出徽州这块“四塞之地”,确实是人们避难的“乐土”,而对于这个群山环抱的徽州来说,则无异是三次大“开放”。不过,这三次“开放”,只是外界人口“开”进来,却很少有本地人口“放”出去。

经过以上三次人口的大流入,这里的“客户”超过了土著,外来“名族”多于本地大姓,户口也逐渐增多了。据明代《新安名族志》记载,徽州计有“名族”56个,考其来源,有23个“名族”是直接来自中原地区,26个“名族”由中原辗转迁到这里,迁来的“名族”共占“新安名族”87.5%。随着人口的繁衍,人口问题便成为徽州一大社会问题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剩余的徽州人口,自然要另觅谋生之路了。

二 徽州的社会习俗

往昔的徽州,大多聚族而居,这与外来人口的迁入有密切关系。那些由中原迁来的“名族”,本来就有“千丁聚居”的风俗,他们迁到这里以后,为了防止“外”人的欺侮和保持原有的风尚,所以“徽州多大姓,莫不聚族而居”。自六朝以下都是如此。清初徽人赵吉士在《寄园寄所寄》中对徽州的风俗作了简要的记述:“父老尝谓:徽州有数十种风俗胜于他邑,千年之冢,不动一抔;千丁之族,未尝散处;千载谱系,丝毫不乱。”人们“重宗谊,修世好”。在这里,一个家族,犹如一个小社会,家族之内人们的宗族观念极强。族长是一族的最高首领,有权处理本族的一切事务。族丁违反“家规”、“祖训”,族长有权以宗祠为公堂,按照“族法”予以惩治。族丁在族长面前都是“顺民”,听从族长的管制和役使。而别尊卑、序亲疏以维系宗族统治的是族谱。徽州各姓,特别重视纂修家谱。因之,“族必有谱,世系数十代尊卑秩然”。徽州的家谱保存到现在,其数量也是最多的。这种“重宗谊”的社会风俗,对徽州商帮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。

徽州在重宗族的同时,也非常重视门第。名门大族与贫弱小姓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尤其是“婚姻论门第,辨别上中下等。”如果是“仆隶之裔,虽显贵,故家皆不得与缔姻。”若有紊乱名分,“始则一人争之,一族争之,既而通国(徽州)之人争之,不直不已。”^③这种六朝门阀制度的残余,一直保持到清代。

徽州一向民风淳朴,崇尚节俭。男子“力作于山”,女子“操持家务;男尚勤劳,女尚贞节。在明代中叶以前,徽州人大多生计艰难,甚至饔飧不继。他们“居乡数月,不沾鱼肉”,而且习以为常。徽州如此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,是这里人多地少,且耕“徽州之田殊累人”。据记载,元明之际,本地所产的粮食,只供所需的三分之

一,三分之二都靠外地输入。“一日米船不至,民有饥色;三日不至有饿莩;五日不至有昼夺。”^④徽州人的俭朴之风,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。而徽人从商,也是由于形势所迫。诚如《歙问》所说的:“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,亦其势然也。”

穷则思变。徽州人本来安土重迁,不事商贾。大约在明代成化、弘治以后,人们渐渐改变了“轻去其乡”的习俗,纷纷逐什一之利于他乡。到了万历时期,徽人则是“十三在邑,十七在天下”,“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”。随着出贾成风“虽闾閻之家,也不憚为贾”了。^⑤

徽州商人向来“轻别离”,他们外出经商,大多春月离家,冬月怀归,甚至有数岁一归者,个别的还有几十年一归。汪于鼎的《新安女史箴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歙县有位商人娶妇才三月便出外经商,其妇在家刺绣为生,每年将节省下来的钱置一珠用彩丝系起来,曰“纪岁珠”。待到丈夫远贾回来时,妻死已三年。他開箱视物,知妇已积珠二十三颗。可见这位商人外出未归已经二十六年了。民国《歙县志》记其事并评之曰:“只此一事,而其时礼教之谨严,生计之迫压,家族之苦痛,交通之闭塞,皆可见矣”。同时,也反映了徽州商人勤于事业、努力致富的“徽骆驼”精神。

徽州人原来不肯“轻去其乡”,到了明代中叶以后,他们却纷纷离开故土,足迹所至,滇、黔、闽、粤、豫、晋、燕、秦、齐鲁、赣、湘、川、藏乃至“山陬海涯,无所不至”。尤其是在大江之南的苏、浙各地,几乎到处都有徽州商人,曾有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谚。由此可见,徽人出贾成风,自然也就要结伙成帮了。徽州商帮的形成,也反映了徽州的民风习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大的变化。这种变化,又给徽州社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新的契机。

三 徽州传统文化

明清时期的徽州,既是“商贾之乡”,又被誉为“东南邹鲁”,并由此而孕育出为世人所瞩目的“徽州文化”。从文化的本身来看,“徽州文化”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承上启下的文化,它既表现出“文化保守主义”的一面,又有反映“文化变革”的一面。这正显现出徽州的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。

提到徽州的传统文化,追本溯源,主要是由于自六朝到唐宋几次中原人口的大迁入。这几次迁到徽州来的人,虽然增加了山区的人口负担,但却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技术文化、社会制度文化和观念精神文化。其结果,不仅改变了原来山区的文化风俗,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,给落后贫穷的山区,提高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,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。

魏晋以前,徽州的土著居民主要为山越人,他们过着刀耕火耨、仰给山场的粗放生活。山越人“自昔以材力捍卫乡土为称”,少习诗书,形成了所谓“山越文化”。其后,由于“中原衣冠避乱保于此,后或去或留,俗益尚文雅。”^⑥有些“衣冠”华胄,不仅举室南迁,而且还带来了部曲、家兵、佃客。因此,他们在将中原地区长期积累起来的生产技术、社会制度带到徽州山区的同时,也倡导了读书和习礼明理的风气。于是,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、宗族文化、门阀文化、婚姻文化、丧祭文化、伦理文化、仆役文化等等,都传到这里,山区的俗习风尚渐渐向“文雅”转变了。

南宋时期,徽州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桑梓之邦。朱熹原籍婺源,外祖父祝确,歙县人,为当地富户,人称“祝半州”,反映了他家的财产可当徽州之半。朱熹小时候得到外祖父的教育与培养,后来便常回故乡传播理学,在徽州影响极大。元、明时期,徽州人大多“喜读朱子之书,取朱子之教,秉朱子之礼,”^⑦对朱熹几乎是

顶礼膜拜。尤其是理学所宣扬的伦理文化,渗透到徽州人的心灵深处,朱熹手订的《文公家礼》,是徽州人所崇奉的信条。此后,徽州的文化,便打上了“朱子”的印记。徽州的各姓家谱,在有关“家规”、“家训”中,无不都提到朱子《家礼》,认为《家礼》所规定的“冠、婚、丧、祭诸大典,炳如日星”,要“遵而行之”。诚如光绪《婺源县志》中所说的:“自朱子得河洛之心传,以居敬穷理启迪后人,由是学士争自濯磨以冀闻道,风之所渐,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义。”

明清时期形成的“徽州文化”,它因袭了六朝以来的传统文化,而“朱子之学”更是渗透其中。“新安理学”直接肇自朱子,所谓“文公为徽学宗传”(以往文献中所称的“徽学”是指理学),那是合乎事实的。同时,一些社会制度文化也是与旧时的制度文化一脉相承。此外,由于徽州商帮的崛起,以商帮为“酵母”而出现了商人文化、园林文化、建筑文化、绘画艺术文化、戏剧文化、篆刻文化、饮食文化等等,这给徽州传统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,表现了时代的特征。但上述新形成的文化,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往包括朱子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影响。

在徽州的传统文化中,有一个比较独特之处,那就是宗教势力较为薄弱。虽然早在隋唐时期,徽州境内就有佛教的寺、院、庵、堂,直到明清时期也不乏寺庙建筑,但佛教在这里影响较小,因而有名山而无名寺,有庙庵而无名僧。不过,道教在徽州却有一定的影响。从北宋宝庆二年(1226年)方士余道元在齐云山布道以后,经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提倡,于是,齐云山声名大震。但佛、道二教与儒教的影响相比,还是小巫见大巫。儒家学说,向来是“抵排异端,攘斥佛老”,由此也可看出儒家思想在这里的主宰地位。尤其是后来的“洋教”,在徽州更难立足。清末许承尧在《歙事闲谈》中说:“徽州无教门,亦缘族居之故,非惟乡村中难以错处,即城中诸大姓,亦各分段落。所谓天主之堂,礼拜之寺,无从建矣”。西方的“洋教”几乎被拒之于域门之外。从传统的文化观念来看,“洋

教”更是“异端”，更是应当排斥。许承尧把“无教门”和“族居”联系在一起，亦可得知到了清末，徽州的封建文化、宗族观念还是相当浓厚的。

四 徽州商帮的素质特征

徽州以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尚，涵养滋润纵横商界达三个多世纪的徽州商帮。这支商界劲旅，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市镇的兴起，商品市场的转型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，以及徽州得以“富甲江南”都起着较大的作用。

徽州商帮作为一方地域的商人群体，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对社会经济、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，有不少人“五年而中（贾），十年而上（贾）”，很快致富发家，有一些在商界同行业中成为“祭酒”即首领人物，这都是与这个商人群体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较高密切相关的。

宋元以来，徽州便是一个“文献之邦”，书院兴起，文风特盛。所谓“虽十家村落，亦有讽诵之声”，^⑧并非夸饰之词。徽州商人生长于这种社会环境中，他们大多数人自幼即入学就读，其目的多是为了追逐于科举仕进之途。其后，或因中试不第，或因家道中落，或因克绍箕裘子承父业等等原因便转而从商。因此，在从商之前，有不少人便饱读了经史百家之书，粗通翰墨。有些人在经商过程中，还是“经史子集环列几前，至老未尝释卷。”^⑨可见，徽商是一支有文化的商帮，有的既是商人，又是文人。这支商帮的一个重要特征，便是“贾而好儒”、“商而兼士”。早在明代，就有人称徽商为“儒贾”。所谓“儒贾”，大致有两层含义：一是指徽商多是“业儒”出身，是有文化的商人。二是指徽商以“儒道”经商，即以“儒学饰贾事”。“儒贾”二字，反映了徽商的文化素质和经商的思想素质，也是徽商不同于其他商帮之处。

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是有密切联系的,甚至可以说,文化素质是思想素质的基础。文化素质较高,其思想素质也必然是很高的。“多才善贾”,自古皆然。不仅经商需要这两方面素质,即是百工技艺也是一样。清代大戏剧家李渔就曾说过:“学技必先学文……通天下之士农工贾、三教九流、百工技艺皆当如是观。……明理之人学技与不明理之人学技,难易判若天渊。然不读书不识字,何由明理?故学技必先学文。”我们从这段话中所得到的启示是:“学文”方能“明理”,只有“明理”才不难学得高超的技艺。同样,也只有“明理”的商人,才能审时度势,决定取予;运以心计,精于筹算,以致“获利如操左券。”尤其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,社会分工不断发展,商业联络网日益扩大,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,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行将接轨,商业竞争也日趋激烈。在这种形势下,商人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较高,就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,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,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,应能在商潮逐浪中扬帆前进。这在徽州盐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。

徽州盐商是这支商帮中最富有的商人。他们当中“藏镪百万”者比比皆是,有的竟至“以千万计者”。因此,盐业,乃是徽商经营行业中的“龙头”行业。但是,从事盐业经营,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分析能力,这是因为:

其一,盐业从汉代以来都是国家经营的行业,自唐宋以迄明清,国家财政收入,几乎是“半出盐赋”。因此,国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盐业,掌管盐课。而盐政衙门的官员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,盐运司的最高长官盐运使,在明清时期大多是进士出身,有的乃是饱学之士。其时,“行盐之法”主要是“官督商办”,“商”与“官”交往甚密。盐商特别是总商、大贾,经常出入于盐政衙门,就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,才与盐官有共同语言,共同雅趣,甚至成为与盐官唱和往来的诗文之友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文化知识便是盐商通往盐政的桥梁,是“官督”与“商办”之间一条隐形纽带。

其二,正是由于盐业官营,所以,国家对盐的生产、贩运、销售、课税,都有较完备的政策规定,这就是盐法。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,形势的变化,盐法亦常因革损益。而经营食盐的盐商,就必须熟悉盐法。不仅要熟悉“本朝”的,而且还要熟悉历代的。只有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商人,才能读懂盐法,依法行盐。有时盐官要和盐商讨论历朝盐法的利弊得失,盐商还要提出合乎事实的见解来。这里,仅举一件较为典型的事例:

明代有一位歙县商人叫黄崇德,在两淮经营盐业。他原来“有志举业”,即准备参加科举考试,当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。后来从事盐业经营,成为“家资巨万”的富商,且在两淮商界有较高的地位。其所以能如此,据歙县《竦塘黄氏宗谱》载:“……惟嵯国家仰给有法,或沿或革,自汉论嵯以来,至于唐宋《食货志》嵯法之议,纷纭不一,莫能究其指归。公(黄崇德)博览多通,上自《春秋》、《管子》之书,东汉盐铁之论,唐宋食货之志,明兴《大明会典》,讲求周悉。乃盐司下询,则条陈利害,言论侃侃,盐司辄可其议,下其法于淮之南北。夫淮海诸贾,多三晋关中人,好唾奇画策,见公言论,皆削稿敛衽从公,推公为纲。”

这条材料,说明了黄崇德由于“博览多通”,所以在“盐司下询”时,能旁征博引,侃侃而谈;在“条陈利弊”时,能持之有据,言之成理。在徽商中,像黄崇德这样有文化知识的人,并不是个别的。这一事实,既反映了徽州商帮的文化程度,也表现出“儒贾”的辨析能力。与此同时,山陕商人本好奇谈画策,但在黄崇德面前,却“削稿敛衽”,那也不是无缘由的。清初,曾就有人指出过“山右积习,重利之念甚于重名,子弟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,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。”^⑩足见,山右商人(晋商)的天赋虽“俊秀”,而文化水平则不高。因此,他们与徽州的“儒贾”相比较,自然要逊色三分了!

徽商因是“儒贾”,所以,他们经营商业也是恪遵“儒道”。以“儒道”经商,其特点就是:非义之财不取,非义之利不求。徽州商